

传承之光



▲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的白棉布束腰窄袖褶袍。

1999年春，河北隆化县，一处名为“鸽子洞”的崖洞内，一批封存600余年的珍贵文物被偶然发现。洞内出土元代纺织品、文书等文物共计67件(套)，引起学界与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同时出土的相关文书记载，这批文物所属年代应为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年)。考古工作者推测其主人为躲避兵祸，仓促将物品藏匿于洞中，后因故未能返回取走，遂使这批元代遗存沉睡至今。近日，“经纬织山河——河北隆化鸽子洞藏元代丝织品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这批历经沧桑的织绣珍品，经过修复人员长达数年的精心修复与研究，终以完整风貌与公众见面。

它们不仅是元代服饰艺术的代表之作，更是一部以经纬织就的立体史书。该批文物中的“白棉布束腰窄袖褶袍”为古代出土服饰中较为罕见的棉质服装。袍服长121厘米，以腰部为界，呈现出鲜明的“上紧下宽”形制：上身部分为交领右衽，袖口与腰部均作紧束处理，显得利落挺拔；下身则通过褶间工艺实现“由束到放”的过渡，形成类似裙摆的造型。究其原因，多是为适应草原民族善于骑射的生活需求。即便到明代，此类长袍仍是外出骑乘的经典着装，可见其设计的实用性与持久生命力。

上新了

北方白瓷的岁月之歌

赵凡奇



近日，山西博物院主办的“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开幕。展览遴选14家单位收藏的200余件白瓷珍品，以历史朝代为主线，通过窑口串联，呈现北方白瓷的发展历程和丰富内涵。

我国北方是中国白瓷的摇篮。白瓷诞生于北方，从北方走向全国，由中国迈向世界，承载了辉煌的中华文明。北方是民族融合的热土，从晋国霸业到胡服骑射，从单于和亲到敕勒长歌，从唐蕃会盟到澶渊之盟，谱写了悠扬的岁月长歌。

“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首次呈现了北方白瓷的生命周期。展览分为4个单元：南北融合、四海同风、和合共生、寰宇霍器。这4个单元分别对应北方白瓷不同的发展阶段，展示了北方白瓷萌芽于北朝晚期、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辽夏金、衰落于元朝的完整生命周期。

北朝工匠在生产青瓷过程中，不断创新制瓷技术，促进了白瓷的萌芽。山东淄博寨里窑采用两次施釉的方法，使釉面变得光亮；河北磁县贾壁窑、邯郸临水窑改善胎釉配方，降低釉中含铁量；河北内丘邢窑、河南安阳相州窑使用白色化妆土，弥补胎色较深的缺陷。

隋代白瓷完全成熟，胎色洁白，胎质坚硬，釉质光润，器型多样。白瓷产地有相州窑、巩义窑、邢窑等3处窑场。唐代白瓷迅速发展，邢窑、巩义窑是当时白瓷窑场的翘楚。

宋辽夏金，北方白瓷迎来最为繁荣的阶段，长城内外窑火不熄，定窑、龙泉窑、苏峪口窑、河津窑等窑场交相辉映。陶瓷工匠的交往、制瓷技术的交流、造型装饰的交融，表现得十分明显。

元代北方白瓷普遍衰落，霍州窑却逆势而兴，造就了北方白瓷的最后高峰。元代霍州窑以细白瓷产品为主宗，造型极为规整，修坯精细，支烧痕极小。印花装饰由细凸线向浅浮雕转变，常见鱼纹，并蒂牡丹、莲花等。出现了鳌耳杯、高足杯、高足碗、玉壶春瓶、折沿盘等器型。

民族融合促进了北方白瓷的发展。北方白瓷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载体。北朝时期，北方窑工借鉴南方制瓷技艺，利用当地黏土资源，经过长期实践，控制了胎釉中的含铁量，白瓷由此萌芽。隋代继承北朝的白瓷技术，将白瓷推向成熟。唐代白瓷获得很大发展，流通范围进一步拓展，使用人群进一步扩大。元代霍州窑继承中原制瓷传统，吸收草原文化因素，成为古代北方白瓷最后的高峰。

我们期待公众走进此次展览，了解北方白瓷，感受瓷器文化，体悟中华文明，厚植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图①：元代白瓷玉壶春瓶。山西博物院藏

图②：辽代白瓷皮囊壶。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以上图片均为山西博物院提供

洞藏锦绣六百年

贾 汀

这件褶袍以棉布为面料，做工颇为精细。尤其是这件袍服的托领部位，造型为如意云纹图案，采用贴缝工艺缀于后领部，并与领底相接。虽为素袍内服，却恰切诠释了“简约而不失高雅”的美学追求，体现出古人“简于形而精于工”的制衣智慧。

与骑射袍服的英武飒爽相映成趣的是出土文物中蕴含的温雅精致的生活美学。该批丝织品中刺绣类饰物较多，其中以“绿暗花绫彩绣花蝶护膝”与“白暗花绫彩绣花鸟婴戏护膝”最具代表性，它们是国内仅见的元代护膝实物。这两件护膝材质上乘，刺绣精美鲜活，反映了元代丝织装饰中自然景象与生活情趣的融合。把寻常日子的美感一针一线缝进衣服里，是那时人们装点日常的温暖见证。

此次出土的纺织品中，除华美衣衾外，还包含许多“百衲”半成品、残帛片与裁剪余料。这些常被忽视的零碎织物，与完整衣物一同被珍重保存，提供了与墓葬随葬品截然不同的历史样本。墓葬器物往往呈现礼制化的“完整”与终结，而此洞窟为战乱时的临时藏匿处，封存的是仓促间带入洞中的现实生活痕迹。这些碎片并非仪式用品，而是生活“进行时”的见证，生动体现了古人“爱物惜福”的生活哲学，还原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真实历史场景。

鸽子洞丝织品中，纺织与装饰工艺直观反映了元代物质文化交流的盛况。

元朝在礼仪制度上既“坚守蒙俗”，又承袭“唐宋之制”。在鸽子洞的考古发现中，不仅出土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束腰窄袖袍服，还发现两件中原汉族传统的直领齐腰式半臂短袄，体现了元代服饰多民族融合的时代特点。

我们也可见到中外工艺的交流互鉴。元代具有尚金的审美意趣，将黄金制成金线织入锦缎成为风尚。自西域传入的“纳石失”(《元史》载：“金锦也”)与中原本土的织金绫和织金罗面料在元代交相辉映。“绿色

云纹四经绞织金罗”质地轻透，金光隐约闪烁，工艺复杂，推测为带襕的定织面料。该织金罗所用片金十分独特，经检测为羊皮背上两面贴金箔的工艺，这是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织金罗实物。

还有纹样题材的妙合成趣。该批纺织服饰纹样以中原汉式题材为主，如“满池娇”“婴戏莲”“四季花卉”“耄耋同春”等。其中，“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面”的精美图案尤为引人注目：被头上织有一鸾一凤舒展卷云状尾羽，飞舞于莲花之间；被身上为串枝牡丹莲花纹，辅以小朵莲花、牡丹等。被面整体色彩艳丽，雅致大方。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工艺上，该被面首次采用四枚缎为地组织，标志着从宋代三枚缎向明清五枚缎的过渡，在工艺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让这些深埋地下六百载、脆弱不堪的丝织品重焕光华，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科学工作。2006年，国家文物局将鸽子洞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列入重点计划，由隆化民族博物馆统筹，首都博物馆王亚蓉修复团队负责开展修复保护及文化阐释的研究工作。

修复团队面临着巨大挑战。织物长期处于崖洞庇荫的埋藏环境中，普遍存在糟朽、板结、污染、褪色和严重破损等问题。修

复过程遵循着严谨的科学路径：首先对文物进行全面的病害调查与测绘记录；利用科技设备对织物纤维属性等进行无损或微损分析，为后续消除霉、清洗及加固提供依据。

以一双绣花女鞋的补配加固修复流程为例，面对丝线断裂或面料缺失，修复师需采用“显微外科”技术，将传统针法与显微设备结合。针对原缝切痕迹中0.2毫米针脚、1毫米针距的细微特征，修复师须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下精准运针，严格依照原针眼、针距进行倒针绗缝。新配丝线须在“形”上与原文物一致，在“质”上则通过老化处理，使其弱于原线。这一切既依赖高超技艺，也离不开耐心与专注，方能在毫厘之间实现严谨修复。正是凭借这种将传统手艺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倾注耐心与敬畏的“匠心”，这批珍贵的元代丝织品才得以摆脱时间的侵蚀，以最接近原初的面貌，展示着元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隆化鸽子洞的织绣珍珍，勾勒出一幅远比文献记载更加鲜活丰盈的元代社会图景。此次展览，既是对工匠精神的深情礼赞，亦是对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生动诠释。

(作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

本文图片均为贾汀提供



被面上，被头部分织有精美图案。
被面上，被头部分织有精美图案。

“四普”新发现丰富嘉兴文物家底

马鑫宇

承载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浙江嘉兴，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中新发现文物353处，新发现率达15.04%，位居浙江省前列。从北宋塔基的千年回响到红色场馆的时代记忆，这些新发现如同散落在大地上的珍珠，经过有效“串连”，愈发璀璨夺目。

“边普查边保护”让文物安全有了“提前量”。以“四普”为契机，嘉兴完成了不可移动文物安全体检标准的起草，启动了保护利用指南的编制，为文物量身定制保护方案。在353处新发现中，东塔寺遗址与南湖革命纪念馆老馆的“亮相”，彰显着嘉兴“历史悠久、红色鲜明”的城市特质。

东塔寺遗址位于嘉兴老城以东2.1公里，面积约4万平方米，历史可追溯至南朝。据清代《嘉兴府志》记载，寺院初名已不可考，历经“报国禅院”“东塔广福教院”等变迁，因寺内东塔成为胜景而得名。东塔寺是嘉兴“七塔八寺”中最古老的一座，清代“东塔朝瞰”更是“嘉禾八景”之一。

发现过程充满曲折，是偶然，更是必然。2023年夏，遗址所在区域启动拆迁改造，普查队员在考古前置调查中，注意到地基下的砖石碎瓦与寻常建筑垃圾不同。“当时工地上堆着厚厚的渣土，若不是对‘嘉禾八景’的文献记载有印象，很可能就错过了。”参与发掘的市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回忆道。队员们顶着酷暑查阅《嘉兴市志》等10余部文献，从“东

塔在城东南二里”“东塔高数丈，晨辉透塔影”等寥寥数语的描述中锁定东塔寺遗址的大致方位，结合实地勘察反复推敲，最终在地下3.5米处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塔基。

东塔寺遗址入选浙江省2024年度十大重大考古发现。已揭露的塔基遗址保存完整，时代明确，是国内首次完整揭露的、结构处理最为复杂的塔基遗址，代表了北宋时期江南建筑基础做法的最高水平。其独特的防潮设计，展现了古人对水乡潮湿软土环境的卓越适应能力，为研究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同步规划的东塔寺考古遗址公园已完成概念性方案，未来，这里将成为集文物展示、宋韵体验于一体的文化新地标，让市民触摸千年历史的文化脉动。

南湖革命纪念馆老馆的人选，体现了文物普查对近现代遗产的重视。这座位于南湖东岸的建筑，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建，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随着“边普查边宣传”“边普查边保护”理念的深入，越来越多市民通过热线、邮箱等方式向普查办推荐南湖革命纪念馆老馆，有关部门在“四普”工作会议上提议将其纳入新发现名录。大家形成了共识——它见证了伟大建党精神，承载着嘉兴人民的红色记忆，理应被珍视。

普查队员深入研究后发现，南湖革命纪念馆老馆承载着独特的红色记忆与社会价值。1990年，嘉兴市政府发起“我为南湖增光辉”活动，嘉禾儿女踊跃捐资，共同建造了这座纪念馆。最终，南湖革命纪念馆老馆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身份入选新发现名录。

东塔寺遗址的发掘，让人们看到江南水乡宋代建筑的智慧；南湖革命纪念馆老馆的纳入，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这些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嘉兴的文物家底，更让这座城市的历史轴线更加清晰、文化脉络更加连贯。

(作者单位：浙江省嘉兴市文物局)



本版邮箱
ysbj@people.com.cn
本版责编
王 璞

动物资源标本库中的文明史

吕 鹏

的骨骼。
今三
河三
千三
百年的
出土的
家马



标本库体系由中国古代动物标本库与中国现生动物标本库两大部分构成。中国古代动物标本库系统收藏来自26个省区市121处考古遗址的古代动物骨骼标本，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标本按东北及内蒙古东部、黄河上游及西北、黄河中游、黄河及淮河下游、长江上游及西藏、长江中下游、岭南及周边等七大考古地理文化区进行布列，每件标本均建立翔实的“身份档案”，包含遗址信息、年代、出土单位及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动物标本库汇聚了众多中国乃至世界之最的珍贵标本，堪称动物驯化

史的“活态档案”。其中，河北南庄头遗址出土的距今1万年的家犬遗骸，作为中国最早的家养动物实证，与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的家猪骨骼共同证实中国古代先民在动物驯化领域作出的原创性世界贡献。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家养绵羊标本，揭示了牧业经济的起源脉络。河南南台寺遗址出土的距今4500年的家养黄牛遗存、河南殷墟遗址出土的距今3300年的家马骨骼，印证了中原地区驯化食草动物的历史进程……这些发现共同彰显了古代先民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发展轨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圣牛遗骸——这一已灭绝物种的发现，引发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思考。

中国现生动物标本库广泛收藏贝类、鱼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等现生动物骨骼标本，覆盖全国多个生态区域，兼具科研、教学与收藏价值。每件现生标本同样拥有标准化档案，记录其种属、性别、年龄、采集地、来源背景及制作方法等。从体形硕大的骏马到娇小玲珑的家鼠，从骨骼数量最多的蛇

到兼具内骨骼与外骨骼的龟鳖，从栖息陆地的梅花鹿到遨游水中的青鱼，从“鹬蚌相争”典故中的鸟与蚌，到“鱼羊为鲜”美食文化中的鱼与羊，中国现生标本库的收藏可谓丰富多彩。

从60年前的零星收集到今天库藏10万余件动物标本，中国动物资源标本库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时空覆盖最广、谱系最完整、种群最具代表性的动物考古资源保藏与研究中心。标本库为揭示古代环境变迁、资源利用、技术发展与生业模式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也发挥着科学普及、文化传播的桥梁作用。未来，我们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的家猪骨骼。以上图片均为吕鹏提供

考古中国

用【新钥匙】直接进入母系社会内部

母系社会这个词，大众并不陌生。课本、纪录片和科普读物中常常提到，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曾以母系血缘为纽带。在大众印象里，它几乎像一个确定事实。但如果追问一句：母系社会究竟有没有实证？它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被识别？答案却并不清晰。

传统考古学可以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聚落布局等线索推测社会组织，但往往难以回答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墓地里的人彼此是什么关系？没有亲属关系作为支撑，关于氏族、婚姻与群体结构的讨论就容易停留在推断层面。也正因如此，“母系社会”虽然被反复提起，但真正能够在史前遗址内部直接验证母系氏族结构的证据并不多。

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傅家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500年。考古发掘显示，这里存在两处墓地，墓葬排列清晰，人骨保存较好。对古DNA研究而言，这类条件并不常见。许多遗址即便出土骨骼，DNA也常被土壤环境破坏而难以提取。傅家遗址的材料保存状况，使我们能够用古DNA这把“新钥匙”，进入史前社会内部，观察过去难以触及的亲缘网络。

研究的出发点很朴素：如果能像现代亲子鉴定那样，通过遗传信息推断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那么关于氏族与社会结构的讨论，就能从“可能”走向“可验证”。

古DNA研究过程十分艰难。第一步是严格无污染取样，样品多来自牙齿或颞骨等更易保存DNA的部位；随后在洁净实验室中研磨、提取、建库。古代DNA在时间作用下高度降解，片段短碎、含量极低，还混杂大量微生物DNA。获得测序数据后，还要评估现代污染、识别典型古DNA损伤特征，并进行遗传性别鉴定等。最关键的一步，是通过全基因组共享片段与遗传相似性计算亲缘关系，判断个体之间是否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或更远的堂表亲关系，从而把史前人群重新“织”成一张可检验的关系网。

当这张关系网逐渐清晰时，最重要的发现出现了：傅家遗址中存在两个边界清楚、长期延续的母系谱系群体。线粒体DNA由母亲传给子女，是追踪母系谱系的重要遗传标记。如果一个社会真实存在以母系为核心的氏族结构，那么在母系遗传标记上往往会出现稳定聚集，并与其他群体形成分界。傅家遗址的遗传结果符合这一特征，两组母系谱系差异清晰，并在墓地中延续稳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界并不意味着隔绝。相反，我们看到他们共享相近的丧葬传统与文化实践，同时通过婚姻与亲缘联系维系为一个整体社区。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内部结构清晰、长期稳定运转的史前共同体，而不是简单的两个群体碰巧聚在一起。

这项研究的难点并不完全在于技术。古DNA测序确实需要先进平台与严格流程，但真正困难在于解释：DNA给出的是生物学亲缘关系，而社会结构还包含制度、文化与认同。如何把遗传结果与墓葬布局、随葬组合、空间分区等考古证据严密对应，避免过度推断，同时提出可经验的解释，是研究最需要谨慎的环节。

傅家遗址研究的意义，不止于证明某个遗址存在母系氏族。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古DNA不仅能回答人群从哪里来，也能深入回答人群如何组织成家庭、氏族与社区。过去，面对史前墓地，我们更多看到沉默的排列；今天，我们有机会看到其中的亲缘网络与群体结构，从而理解史前社会如何维系稳定，形成共同体。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也是理解社会演化的一把钥匙。社会并非抽象概念，它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及其关系构成。能够在4500年前的墓地中识别母系氏族的边界与联系，意味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更真实的史前世界；那里的人们有家族、有婚姻、有共同体，他们的秩序真实存在过，并以骨骼与遗传信息的方式被保存下来，等待今天被重新读懂。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